**【印度妇女研究热点问题专栏之二】**

**教派冲突视域下的印度妇女·专栏导语**

陈义华[[1]](#footnote-1)\*

印度被誉为人类宗教博物馆，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样本。这些宗教大多是印度本土宗教，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大规模宗教改革，因此相对保守。虽然从殖民时代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到后殖民时代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人都曾致力于推行世俗化改革，但终究如蚍蜉撼树，难以动摇其根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后殖民时代依旧猖獗，教派冲突此起彼伏，对南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对南亚地区国家统一体叙事构成重大危机，其中印度大分裂就是宗教冲突下国家统一体建构失败的一个例证。大分裂期间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超过一百多万人死亡，有籍可查超过七万名妇女被对方教派的信徒强奸，制造了现代文明史上最大的人道灾难。震惊了整个世界。

时至今日，南亚宗教矛盾与冲突依然难于平息，社会结构脆弱，有时候可能一个平常事件都会在有心人士的推波助澜下演变为骇人听闻的流血冲突，而女性往往是这些暴力冲突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即便在平时，各社群的教派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生活。由于 性别偏见根深蒂固，女性，无论是在家庭的私领域空间中，亦或是社会公共空间中，都被另眼看待，遭受着歧视和压迫，骚扰乃至身体的伤害：在家庭内部，印度女性在家庭重大事务上没有话语权，更无法获得与男性家庭成员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印度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女性几乎没有什么能见度，他们多数人的活动领域被局限在私领域中。即便少部分人有幸获得在公共领域的活动机会，也时常面临着遭遇性侵害甚至更为严重的暴力受害的，的风险。

对印度女性来说，印度社会最大的毒瘤，就是一直以来不断频发的强奸案。这一给女性身心造成巨大创伤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不仅仅与印度各宗教社区女性地位的低下有关，更与印度教下面一些教派将性活动看做自我提升的修炼逻辑有关。频发的恶性强奸甚至奸杀案不仅仅引起了印度总理莫迪的重视，也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关注。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状况。对印度女性来说，更为惊悚的时刻来自于教派冲突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失控状态。在教派冲突中，国家机器运作失灵，女性成为了敌对教派肆无忌惮羞辱，虐杀的猎物。在教派冲突的时刻，女性不再只是本教派成员而已，而是作为本教派的象征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强奸甚至公然羞辱对方教派的妇女不仅仅是欲望的发泄，更意味着更高精神层面的复仇：羞辱敌对教派。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之下，每隔几年爆发的教派冲突对于印度各教派的女性来说都意味着一场噩梦。

2017年《妇女研究论丛》开设了“印度妇女研究热点问题专栏”涉及妇女的“财产权立法”、“妇女安全保障”、“重大历史场域中的妇女”等多项重大热点问题，但每一个议题的讨论基本就一篇文章，没法从不同角度深入讨论这些热点问题。本次专栏文章是去年专栏的延续，聚焦于一个专题：“教派冲突视域下的印度妇女”。本专栏共征得四篇稿件，分别聚焦于教派冲突中妇女集体殉身事件的历史分析；南亚大分裂中女性的贞操、安全、尊严等议题及其与印度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印度少数教派妇女的平权运动及其与本教派社区的关系；后殖民时代妇女创伤记忆研究的范式重构。

深圳大学王伟均博士的论文《暴乱、“荣誉”与死亡：印巴分治暴力冲突中印度妇女集体殉身现象研究》分析了印巴分治期间印度妇女的集体自杀现象。1947年印巴分治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在社会失序、法律失灵、国家机器近乎停摆的状况之下，各不同教派彼此杀伐，血腥宗派暴力冲突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各个角落上演，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作者关注的议题是大规模教派冲突中的妇女集体殉身事件。作者指出，这一现象既与印度中世纪拉其普特妇女集体殉节传统—裘哈尔仪式—有着承继关系，同时也受到教派冲突中性暴力所引发的妇女自杀症候群的影响，并且与印度社会错综复杂的性别、民族与国家话语息息相关。

罗璠教授的论文《甘地论教派暴力下的妇女贞洁与民族主义价值》以甘地生命最后两年的著作、演讲稿和通信等文献为基础展开研究，考察甘地对于大分裂教派冲突中妇女所遭受暴力的思考。在这些文献中，甘地讨论了在南亚大分裂的激荡岁月中女性的贞操、安全、尊严等议题及其与印度民族主义话语 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甘地赞同妇女远离与政治最直接相关的公共领域，并且坚持公私领域分离，这一主张，一方面在于甘地认为家庭是妇女可以远离教派暴力，获得人身安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还在于，甘地的这一主张与他更大的斗争目标相关：通过让妇女在家纺纱以实现自给自足，抵制英国殖民资本的入侵，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最终实现政治独立。

卢云副教授的文章《当代印度穆斯林女权主义运动及其网络》通过穆斯林组织网络的考察，揭示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如何在性别、阶级、种姓和宗教相互交织的复杂权力网络中协调其多重身份。作者的研究挑战了学界将穆斯林妇女简化为“受害者”的本质主义分类，并重新将她们定义为政治能动者。这篇文章在印度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运动背景下探讨这些组织网络，并肯定了来自边缘社区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积极角色。

陈义华教授的文章《后殖民女性创伤记忆分析的文化研究之维》考察了在源自于西方的精神分析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创伤理论与前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原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二者融合起来分析后殖民妇女创伤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在讨论中结合两个女性文本，讨论在融合重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后殖民妇女在集体创伤记忆中凸显自身创伤经验的路径，提出了有关性别、创伤和国族等一系列问题，为解读后殖民妇女创伤经验提供了一个非西方框架。

印度与南亚、中东以及北非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它持续进行着世俗化变革。后殖民时代印度立国伊始开国领袖尼赫鲁就大力推动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力图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尼赫鲁的世俗化改革由于推动太疾引起了强力反弹，但同时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最大的一个成果是保持了世俗主义的国家宪法，并始终维持了国家政权的中立性质，这使得它就能够有效介入各种教派之间矛盾的协调，避免教派矛盾螺旋式上升为教派冲突；对外政策方面，印度的历任总理在处理印巴关系中始终秉持世俗主义的外交姿态，避免了印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始终将两国之间的矛盾控制在低烈度的可控范围之内。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印巴之间或者印度社会内部教派冲突会重演，但总体而言，这种冲突的规模在不断变小，冲击力在不断减弱。同时，在印巴冲突与印度社会内部冲突之中，宗教因素在逐步减小。南亚社会教派冲突完全消弭可能需要时间，但其趋势却是可以乐观期待的。女性在这个漫长的进程中不仅仅是受益者，也是这个进程的积极推动者。

1. \*陈义华（1973-）,男，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后殖民文学与文化研究。 [↑](#footnote-ref-1)